

中国印刷史

宋代杭州的刻书与毕升发明

活字印刷的地点

项 弋 平

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是在哪儿刻书的，历来无考。张秀民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曾引证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明胡应麟《经籍会通》、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三、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八、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四、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四、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六，以及叶德辉、孙毓修等著述，凡是提到毕升的，无不抄录沈氏原文或节抄数句，其他再未发现新线索。张秀民先生认为毕升与当时杭州人沈括有关，因而推想毕升可能是杭州一带人。李希泌、蔡景峰等编写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1978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也认为毕升刻书地点是浙江杭州（见该书第九十五页）。除了杭州一说而外，有认为毕升刻书地点是在汴梁的（见徐宏兵著《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第四十页，1978年11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还有认为是在建安和成都的，总共有四种说法。认为是在建安与成都的，因为这两地在宋代都是印刷出版中心，但它们与沈括没有多少瓜葛，所以可以排除。汴梁与杭州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于史实呢？我是同意杭州说法的。

有关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唯一记载，见于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和现在盛行的铅字印刷的原理相同，具备了活字印刷的三个主要环节：制活字、排版、印

刷，是相当先进的。在印刷史上应居重要位置。遗憾的是，因为毕升是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布衣”，无能力也无钱财来推广他的发明，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印刷品来做物证。他的生平更不见诸史籍。我们仅能就沈括的生平及其所著《梦溪笔谈》来做一番推想。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人。生于北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一〇三一年）。二十岁以前，随父亲沈周先后在泉州、润州、开封、江宁等地居住。皇佑三年（公元一〇五〇年）父亲沈周去世，沈括回家乡杭州守制服丧。三年后，才承袭父荫，做过多年低级官吏。三十三岁举进士、进京做官。元祐三年（公元一〇八八年）开始著作《梦溪笔谈》。绍圣二年（公元一〇九五年）病逝于润州。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年），这时沈括才十多岁。假使毕升是在汴梁，十多岁的沈括不可能注意到活字印刷，更无力收藏它。即使是沈括第二次到汴梁（嘉佑八年，公元一〇六三年），毕升已死了近二十年，活字早已散失，也不会落到沈括家人手中。但如果毕升是在杭州，则沈括注意到它的机会就多得多，根本原因是“祖居”，而不是“客居”的缘故。其次，《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还说：“沈括二十一岁的时候，在钱塘老家看到了毕升制的胶泥活字，就爱不释手。”假如是这样，则又多了一个旁证。因为沈括二十一岁时，因居父丧，正好是在钱塘老家。第三、《梦溪笔谈》最后说：“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关于这个“群从”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子侄”，晚辈”，则也证明是在沈括祖居的钱塘，而不是在客居的汴梁。第四、沈括与王安石同时，并且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其时他担任过三司使、司天监、军器监等职，在朝廷中是有相当多的权力的，“朝廷新政规画，巨细括莫不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他任司天监时，任用了精于历书的布衣卫朴，拟改阳历，沈括是

赞成并记载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的。假如毕升的发明是在此时此地所发现，则有可能被采用印书；而实际上，毕升的发明似乎没有印过书，这证明沈括发现毕升的活字，并不是他在汴梁当权的时候，而是去京以后。因此，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在汴梁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以上是从沈括的经历及《梦溪笔谈》的记载所做的考证。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印刷术的发展过程来看，活字印刷是雕板印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雕板印刷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的雕板印刷发明很早，早在毕升之前三百年的中唐时期就有了雕板印刷。据古籍记载，大约公元七六二年后，长安的商业中心东市已经有商家印的字帖、医书出卖。公元八二四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写的序文中。说明有人拿白居易诗集的印本来换取酒茶。公元八三五年，东川节度使冯宿认为政府的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民间所印历本“已满天下”。到了宋代，雕板印刷更加发达，技术已经十分完善，出现了许许多多技术纯熟的刻工。本人认为，毕升其人必定是从事雕刻书板的印刷工人，毕升所处的地方也必定是当时印刷业的中心，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只有在从事了大量的雕板活动的基础上，才会发现雕板印刷的缺点与浪费，而探讨新的改革途径；也只有积累了丰富的雕板印刷的经验，才能从事新的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那么，我们再深入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印刷中心不在北方的汴梁而在南方的杭州呢？因为杭州正是具备了这方面的物质、技术条件。我们知道，杭州在宋以前的五代，是吴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近二百年中偏安一隅，避免了战祸的破坏，已经相当繁荣，苏东坡知杭州时（元祐五年，即公元一〇九〇年），曾估计城内有四五十万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教育自然普及。当时，杭州的学校有所谓“文、武两学”、“宗学”、“县学”、“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就有一所，

“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由于教育普及，学生众多，需要供应大量日用的课本、参考书，因此更推动政府与私人的出版事业的发展。从技术条件上说，杭州在五代时已有吴越国钱氏大刻佛经的基础，现有浙江图书馆所藏一九二四年八月从雷峰塔出土的吴越国王钱俶刻的《陀罗尼经》为物证，经上说：“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捨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加上浙东、浙西又是盛产纸张的地方，自然给发展印刷业造成极便利的条件。北方的优良刻工因避战祸，也大量南迁。因此当时杭州公私刻书事业都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自然而然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以公家刻书来说，首推国子监。然而就是首都汴梁国子监校定的《九经注疏》、《十七史》、以及重要的子书、医书、算书等，也要送到杭州来刻板。《玉海》卷四十一《艺文部》云：“至道二年，判（国子）监李至，请命李沆、杜镐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尔雅正义》，从之。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杜镐、舒雅、李维、孙奭、李慕清、王焕、崔偓佺、刘士元预其事。凡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穀梁疏》十二卷，皆校旧本而成之、《孝经》取元行冲疏、《论语》取皇侃疏，《尔雅》取孙炎、高琬疏、约而修之。四年九月丁亥以献。赐宴国子监，进秩有差，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着重点是笔者加的，以下

同）以上是经部的书籍出版情况。史部著作的出版，始于太宗淳化五年（公元九九四年），初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麟台故事》卷二云：“淳化五年七月，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虞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兼秘书阁校理杜镐、屯田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吴淑、膳部郎中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度支郎中直秘阁朱昂再校。又命太常博士直昭文馆陈充、国子博士馆检讨阮思道，著作佐郎直昭文馆尹少连、著作佐郎直史馆赵况、著作佐郎直集贤院赵安

仁，将作监丞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齋本就杭州镂板。”又《南齐书》末，附载治平三年牒云：“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同与管句使官，选择楷书，如法书写板样，如唐书例，遂封送杭州开板。”据上所引各证，知七史也刻于杭州。私家刻书，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它们不但印卖佛经，也大量印行儒家的经、史、子、集、俗文、杂书。北宋私家刻本及坊刻本见于著录者，则有：宝元二年临安进士孟琪所刻《文粹》一百卷（见《黄书录》）、庆历六年京台岳氏刊本《诗品》三卷（见瞿目）、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本《史记索隐》三十卷（见《天禄琳琅》后编四）、治平丙午（三年）建安蔡子文刊《击壤集》十五卷（见杨录）、政和八年杭州大隐坊重校正朱肱《南阳活人书》十八卷（见张志、瞿目、陆志）等，然即此数种，已可见私家刻书，也以杭州为盛。所以宋叶梦得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实在是公允的评价。浙江图书馆已故毛春翔先生在其所著《古书版本常谈》一书中也说：“宋刻本，就地方而言，杭州刻的最精，蜀刻次之，建刻最下。那时所谓国子监本，绝大部分是杭州刻的。”北京图书馆冀淑英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北图通讯》中也撰文说：“浙江地区刻本既多，技术力量集中，因之所刻的书表现了鲜明的地方风格，浙本字体方整，刻法圆润，版式疏朗，刻印水平较高，在宋版书中，可说居于首位。”同时的北方汴梁是否具有这样的条件呢？本人认为是不具备的（尽管它是首都）。北方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陷于战乱之中，公元九〇六年唐朝灭亡之后，五十三年中换了五个王朝。到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

国，北方已是民生凋敝，气息奄奄，更谈不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雕印全部《大藏经》一千另七十六部，这一壮举并未在汴梁实现，而是在千里迢迢的成都完成的。所以、我认为毕升在汴梁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可能性不大。

几年前，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毕升》，笔者从导演于得水来信中知道，电影作者、贵州省作协付主席廖公弦同志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经过两年的研究，断定毕升是杭州人。一九七九年于得水同志接受导演任务后又去考查，跑了全国十三个城市，其顾问宿白教授，也认为毕升是杭州人。所以影片表现的场景完全是杭州西湖、雷峰塔、钱塘江等处。只是电影《毕升》对“布衣”一词的解释与笔者不同，他们认为“布衣”是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所以影片表现的毕升是知识分子形象，而不是印刷工人。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有待进一步考证商榷。

最后，我们说说毕升的命运。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下，平民发明家毕升被埋没了。他的生平和事迹都没有记载下来，但他的发明却因沈括的《梦溪笔谈》而得到保存，名扬中外，对后世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清朝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安徽泾县有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翟金生，以他毕生的精力，同他的儿子、内侄、学生、外孙等十四人一道，花三十年的时间，照毕升的方法，制成泥活字十万个，印出的书有：《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水东翟氏宗谱》。翟金生这种愚公式的可贵实践，为我国印刷发展史添了一段佳话，同时也证明了沈括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述是完全可信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